Co-China 周刊

NO. 153
2014年 5月9日

张铁志：政党的边缘化 | 何明修：公民运动与公民不服从：两条晚近台湾社会运动的路线 | 刘冉：公民社会如何保证台湾不脱轨？



编者的话

4 月 22 日至 30 日，前台湾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先生以 73 岁高龄的身躯绝食抗议，让大家的目光从反服贸重新聚焦到了反核四运动。（关于反核四，可参考周刊第 101 期《公投=民主?——谈谈台湾核四公投》。）不同人对这一“非暴力不合作”举动持以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林义雄是在用道德绑架台湾，有人认为他是牺牲个体换取自由，亦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伦理两难。但大部分人都赞同一点：台湾的公民运动这几年逐渐崛起，相较之下，不论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公共事件中的作用都日益衰微。本期 Co-China 周刊尝试从林义雄绝食的事件切入，介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公民运动经验，以及两地的党派政治现状。

我们首先梳理了香港自 1997 年回归以来发生的公民运动，以时间线的形式帮助大家熟悉背景。张铁志用泛民主派议员绝食的案例指出，近年来香港民主派影响力有限，是公民社会力量在领导政党，主导香港民主运动。在“反服贸”期间，林楠森台湾街头采访收到的反馈表明，许多台湾年轻人对蓝绿两党都不再抱期望，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人民可自救而不必靠任何政党”。更早发生的洪仲丘案后，朱真楷和舒子榕访问了多位当年参加野百合学运的成员，他们指出，台湾已进入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专业分工”阶段，这对民主发展是好事。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用四次民调的数据表明，民进党在两波公民抗争运动（太阳花反服贸和林义雄绝食反核四）中都陷入被动。刘冉则在文中指出，2008 年后，国民党支配下的“竞争性威权体制”让台湾民主制度面临重大破绽，同时民进党尽管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却无力整合蓝绿分化的台湾社会。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何明修教授帮助大家厘清“公民运动”与“公民不服从”两个概念，并指出：如果一直坚持小心翼翼或是沾染政党色彩的社会运动，则后者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压缩，“到后来，只有和平理性与标榜守法的公民运动才会成为主流所能接受的类型。”

我们在第三部分希望将公民运动的探讨内容扩大：顾忠华强调公民社会在运动结束后需要针对国会、政府、政党分别提出举措，才有可能让运动真正成功。林幸妃和邓凯元用太阳花学运的现场报道印证了顾忠华的观点，即只有将“代议政治”的阴暗面一一曝光才能挽救台湾民主。最后，我们希望台湾的经验可以照射到其他地区，因此选择了刘兆佳论述香港建制派和反对派运作变化的文章，以及笑蜀讨论大陆民主运动可能性的文章。

Co-China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述┫

张铁志：政党的边缘化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

“

温和派民主党给人妥协形象，另方面激进派如社民连虽有不少社运群众支持，但影响力有限……换言之，是公民社会力量在领导政党，主导了当前香港民主运动的议程。

”

绝食应该是最撼动人心的社会运动策略，尤其是当数名政治人物集体为了一个重要而伟大的目标而集体绝食。

3 月底，香港 17 名泛民主派议员和成员为了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绝食，他们的口号是“鸡蛋抗高墙，绝食为普选”，并且说希望为日后的占领中环行动点燃第一根火柴。

这个看似悲壮的行动应该是香港政治的震撼弹。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不但市民大多没反应，甚至有不少评论人讪笑批评他们：有人说这代表泛民派黔驴技穷，有人说他们会浪费绝食的道德力量，乃至消耗了民气。

这不是香港人的冷漠，而是政党出了问题。或者如知名评论人李怡先生所说，市民的确变得冷漠，但这是民主党派造成的。

的确，不像台湾八十年代民主化过程中，反对党扮演重要的领头角色，在香港过去几年，在香港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民主党派却是越来越边缘化。

转折点之一是 2010 年民主党拒绝参加其它民主党派发起的五区公投，继而走进中联办，谈判出来一个妥协的选举改革方案，事后备受批评，形象大伤。温和派民主党给人妥协形象，另方面激进派如社民连虽有不少社运群众支持，但影响力有限。

公民力量领导政党

这个事实在近年最大型的社会运动中都可以看出来。2012 年的反对国民教育运动，占领政府总部数天，可以说是香港近年来最重大的社运，却是中学生的学民思潮所组织的。关于政改运动，去年以来最引起关注，也的确成为当前主要平台的是“占领中环”，活动主要是由两位学者和一位牧师发起，而民主派政党也只能尾随其后。（占领中环运动目前也遭遇困境，另文再议。）

换言之，是公民社会力量在领导政党，主导了当前香港民主运动的议程。

看到这里，台湾读者当有感：这不正也是台湾当前的现象吗？

过去几年，马英九成为九趴总统，但是选票却未必能转移到民进党，因为人们很难对民进党有热情，有信心，也看不出他们的价值与方向。在过去几年的重大社会议题上，几乎都是公民社会主导，民进党只能在旁边默默地看（当然有个别议员是积极参与与支持）。这次的学生占领国会运动就再次证明：在这个关于两岸关系的重大政策上，是学生主导的民间运动提出新的立法议程，打开新的社会辩论。

几天前，谢长廷、苏贞昌退选党主席当然是明智决策，民进党是该世代交替，但交替的不该只是世代。如果新一代的掌权者，仍然只是活在封闭的政治高墙中，而不能与社会的新世代和新价值对话，那么他们只能惨绿下去。

至于国民党，刚确定将由连胜文代表出来参选台北市长。在一个民主社会，官二代或富二代当然有权利出来选举，但是如果国民党籍的台北市市长从马英九、郝龙斌到连胜文，都只能官二代才能出线，那么这个党的病不是一般的严重：这注定是一个权贵权力菁英主导的政党，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然是与社会不但严重脱节的，并且是对立的。

回到绝食。绝食者的力量在于本身的信念和绝食者的道德形象。所以当林义雄先生发起为了废核而禁食，已经在文化界中引起强大声援，至今有一千多人联署声援要求尽快废核。如果执政党又继续没听到这个温柔而强悍的声音，那么，下一场风暴可能又要来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香港公民运动时间轴



2014.03 香港泛民主派发起“鸡蛋抗高墙，绝食为普选”的绝食行动，在中环银行间附近展开。

2014.03 香港新闻界人士在特区政府总部发起“反暴力，缉真凶，保法治”集会 —— 高举“不能把我们都杀光”标语游行反对暴力威吓，抗议《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遭遇暴力袭击，

2014.01 元旦大游行 ——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与真普选联盟以“立即落实真普选，公民提名无筛选”，要求实现特首普选

2013.07 举办“**71** 游行”，反对所得不均 —— 香港大学预估有 **9** 万人上街，争取特首、立法议员双普选，抗议所得分配不公。

2013.01 第 **2** 次占领中环 —— 争取 **2017** 年落实特首普选。

2012.09 “反国教”、反洗脑 —— 中学生发起「反国教」运动，反对政府推行亲中国民教育科。活动更延烧到大专生，**9** 月 **11** 日进行大罢课。

2012.03 特首选举：梁振英当选第 **4** 届特首 —— 抗议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介入特首选举；最后由梁振英当选第 **4** 届特首。

2012.03 反对开放“粤港自驾游”—— 反对过境私家车一次性特别配额试验计划，反对广东省的车辆跨境行驶。

2011.10 反对“双非孕妇”

2011.10 “占领中环”运动 —— 响应「佔领华尔街运动」，港版「佔领中环」揭幕，抗议金融霸权、控诉资本主义制度流弊，活动发烧到 **2012** 年。

2010.10 “菜园村冲突”爆发 —— 港府及港铁为建造广深港高铁列车周边措施，计画拆除横台山菜园村，与居民发生冲突，并延烧到 **2011** 年。

2009.12 香港高铁争议 —— 高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爆发造价过高、拆迁影响范围大等争议。

2007.03 泛民主派首次参加特首选举 —— 首次有泛民主派参加特首选举，但候选人梁家杰大败时任特首曾荫权，曾荫权连任成功。

2006. 12 捍卫记忆，反对拆码头 —— 为保留集体记忆，港人捍卫天星、皇后双码头，反对都市重建填海计划，运动持续到 **2007** 年。

2005.06 曾荫权接任特首

2004.04 人大释法，否决普选 ——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权力解释《基本法》，并否决香港行政长官、立法会的「双普选」

2003.07 “**71** 游行”首次登场 —— 抗议《基本法》第 **23** 条（禁止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在回归纪念日 **7** 月 **1** 日，香港社会运动组织以「反对廿三，还政于民」为题，上街游行，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最大规模游行。

2003.07 开放大陆民众赴港自由行

2002. 02 董建华当选第 **2** 届行政长官

1997.07 香港回归中国

本图制作参考《天下杂志》刊登的香港公民运动事件簿，
链接：http://www.cw.com.tw/PicChannelPage/pic_article_cw52901.jsp



林楠森：台湾来鸿：风起云涌的公民运动


林楠森：BBC 中文网特约台湾记者

“

在发动抗议的公民团体脸书网站上，一些网民的贴文表达了对民进党不抱期望，有网民称从民进党近日热切地到中国‘拜码头’来看，其正渐渐国民党化，人民只有自救而不必靠任何政党。

”

最近台湾公民社会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这是月初 20 万网民集结在总统府前抗议。

台湾公民社会一段时间以来风起云涌的运动一直没有间断。在月初逾 20 万网民集结总统府前抗议后，本周最新的一个运动是学者与文化界人士发起的罢免＂马系立委＂联署。

这样的公民运动能在现实上起到什么作用，在台湾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此起彼落地与当权者对抗，标志出像茉莉花革命与阿拉伯之春那样的风潮也吹向了台湾。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台湾过去许多引起公众、群众激愤或恐慌的事件来看，台湾社会的集体注意广度周期很短，任何事件过了一阵子后，原本人们认为天大地大的事往往彷佛从未发生，很难真的改变些什么。

台湾社会的公共议题的注意周期或许不长，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周期仍未结束。在台湾受到人们抗议的马英九，本周即使是在美国纽约过境短暂停留时，也受到了反大埔强拆者的抗议。

（全文请点击原文链接阅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朱真楷、舒子榕：野百合世代：公民运动与政党分途



朱真楷、舒子榕：中国时报记者

“公民社会的力量已成熟，尽管眼前这股声浪是批评当局，将来也可能用来监督民进党。所以，这种发展不能解读为对哪个政党好或坏。但无论如何，当一群“价值中立”的公民，开始有能量突破政治僵局，这对民主发展当然是好事。”

洪仲丘案引爆公民运动，带给政党重要启示，本报访问多位野百合学运要角，大都认为台湾进入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专业分工”阶段，对民主推进是良性发展；不过，也有当年学运干部感叹说“过去 10 多年来，当社会对某个事件不满时，往往会将希望投射至反对党，为何这种期待愈来愈小？”

（全文请点击原文链接阅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观┫

郭正亮：
民进党未必是公民运动的赢家


郭正亮：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前民进党立委

“

民进党历经两波空前的公民运动抗争，却因为自己始终陷于被动，无法凸显扭转乾坤的领导角色，声势不增反减，未必是公民运动的赢家。

”

从 3.18-4.10 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到 4.22-4.30 林义雄绝食反核四，由于不管是反服贸或反核四，都明显反对国民党政策，也和民进党的主张相近，因此大家想当然尔认为这两波公民运动，必然对民进党有利，不少民进党人确实也信心满满，认为民进党必然是今年七合一选举的最大赢家。

（全文请点击原文链接阅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刘冉：公民社会如何保证台湾不脱轨？



刘冉：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政见”观察员

> **原本的台湾民族主义以民进党为代表，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却无力整合蓝绿分化的台湾社会。而公民社会进一步要求分配正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社会公民权，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逐渐形成了跨越蓝绿分野和种族隔阂的共同价值。**

当韩寒以一篇《太平洋的风》再度引发人们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憧憬，台湾学者却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忧虑与反思。韩寒眼中的温文友善、拾金不昧与助人为乐，究竟是否是台湾社会独有的民族特质？台湾的“公民民族主义”究竟包含哪些侧面，又是如何形成？韩寒将之归因于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美德，台湾学者又如何看待？

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民主化过程中，台湾社会的内聚力不断发生变迁，统独议题与身份认同成为饱受争议的话题，更因中国大陆的崛起而诱发了新的困惑。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吴叡人发表论文指出，能够维持台湾政治内聚力的“向心力”，原本是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公民认同；然而，2008 年以来的台湾大选造成了国民党支配之下的“竞争性威权体制”，民主制度面临重大破绽。作者认为，唯有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才能协助台湾度过制度危机、重建公民认同。

本文使用的公民社会概念，意指与国家和市场互为补充和对抗的第三领域，且不包括与国家重合的政治社会。作者认为，台湾的社会运动是民主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曾与民进党密切结盟；但随着 2000 年民进党政权成立，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盟友关系瓦解，从而形成了独立于政治社会之外的、自主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者指出，台湾目前已形成制度化审议（选举、代议、司法等政治社会组成部分）以及非制度化审议（社会运动、媒体等公民社会组成部分）双规并存的民主政治形式。当前者出现破绽时，后者能够积极发挥审议功能，防止民主制度失效，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制衡、促进选票转移、在野党意识形态与正当性的重建。



2008 年马英九与国民党大胜之后，台湾出现体制内制衡失效的危险。此时公民社会恰逢两个契机，因而得以迅速扩张：其一是 2008 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台湾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其二，台湾各地科学园区的不当开发，使土地、农业与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此外，马英九在美国牛肉、八八风灾等议题上的不当处理，也在腐蚀执政党的正当性，创造了强大的反对民意。在反对党丧失公信力、出现政治真空的局面下，公民社会取而代之，成为批判政府的主要力量。尽管公民社会不具备参政能力，却能够促使选票流向民进党，使原本一蹶不振的反对党获得复苏机会，并诱使国民党分裂。

2010 年五都选举中，民进党竟能翻身占据上风，其士气恢复如此之快、蔡英文的个人权威建立如此成功，与公民社会对国民党的制衡力量关系密切。这一过程，作者称其为“逆说的民主巩固”。

这一波社会运动浪潮的特点是，几乎每一次运动都是学生、农民、人权、消费者、环保、公民媒体等多种社运行动者的结盟，这意味着台湾公民社会内部有一个相互重叠且相当稳定的网络。其中，公民媒体扮演了传播、动员、组织与审议的关键角色，它们突破商业媒体的封锁，迅速传播信息，并协助深化公共讨论。这其中既包括公共卫视等“制度内运动者”，也包括“苦劳网”等网络公民媒体，更包括以这二者为渠道的个人公民记者。2010 年大埔农民与警察的冲突，便是在公民媒体的报道之下为公众所知，从而推动了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作者观察到，台湾公民社会的论述正在迫使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朝着更加进步、包容和整合能力更强的方向进化。原本的台湾民族主义以民进党为代表，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却无力整合蓝绿分化的台湾社会。而公民社会进一步要求分配正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社会公民权，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逐渐形成了跨越蓝绿分野和种族隔阂的共同价值。作者指出，这一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抬头，意味着阶级或许将取代族群，成为台湾最显着的政治分歧。

在这种新型社会认同的带动下，民进党也出现了向公民社会靠拢的“再进步化”和“左转”倾向。然而作者在最后提醒我们，台湾社运的“进步本土主义”固然具有公民民族主义的要素，也冲击和影响着政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却并非完整的民族主义，因其虽有趋向于一致的共同价值，但成员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历史脉络与国族认同，从而遗漏了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共同体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

吴叡人，2012，〈社会运动，民主主义の再定着，国家统合——市民社会と现代台湾における市民的民族主义の再构筑（2008～2010 年）〉。页 311-36-5，收录于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编，《交错する台湾社会》。千叶市：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何明修：公民运动与公民不服从：两条晚近台湾社会运动的路线


何明修：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

> **我倾向于将 “公民运动”视为一种论述的策略，重点不在于“公民”的实际内涵是什么，而是这个语汇所衬托出的他者。很明显地，“公民”所召唤的形像就不是“有党派色彩的”、“利己的”、“暴力激进的”政治参与。**

历史会记得 2013 年是台湾的愤怒之夏。 7 月 3 日下士洪仲丘惨死于杨梅的陆军禁闭室，7 月 18 日拒绝区段征收的竹南镇大埔里四户民宅被县政府强制拆除。这两件小人物的悲剧，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以及一连串的社会抗争风潮。就如同突尼西亚用自焚抗议警方索贿的水果小贩 Mohamed Bouazizi，以及埃及被刑求至死的社运人士 Khaled Said，他们的不幸是来自于扭曲而不合理体制，没有预料到是，这却是点燃阿拉伯之春，推翻现代法老王的导火线。

从阿拉伯之春到台湾的愤怒之夏，有许多类似之处。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多半是从各种社交媒体网站获得动员的讯息。网络时代将信息的传播实时化与低成本，更重要地，它能透露商业媒体认为没有新闻价值、而统治者又不想要让人民知道的真相。网络体现了自由的精神，正式的组织已经不是大规模抗争的必要条件，发起社会运动的门坎已经降低到在 bbs 贴文，亦或是在脸书成立社团之层度。网络也是充满创意的场域，因此，在抗争现场我们看到更多有创意与艺术作法的行动戏码，包括在国防部进行“公民教召”、在内政部前种菜、以及使用智能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亮起要求真相的火炬”。

即便如此，我们仍看到了“公民运动”与“公民不服从”两条明显有别的运动路线。

一群社运素人在网络串连，组织公民 1985 行联盟，在 8 月 3 日“万人送仲丘”的活动中，号称有吸引了 25 万人参与。在这场没有政党与社运组织动员的活动中，凯道上的“白色圣十字”是令人动容的影像，就如同“你敢有听着咱的歌”成为脍炙人口的战歌，一场高举民主与正义的“公民运动”俨然正式诞生。公民运动的基调是和平与理性，他们不做违法抗争的行为。结尾的《公民觉醒》演讲清楚地勾勒这条运动路线的轮廓，典型的公民是正



直而关心社会的“超级英雄”，他们不分蓝绿，不计较个人得失，共同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

相对于在紧守法律界线的公民运动，大埔运动则是采取了特意违法的直接行动，用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来向政府施压。在苗栗县政府以突击方式强拆了大埔四户之后，台湾农村阵线愤怒地指控这类行径根本是“召唤革命”，一时间“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口号与贴纸也到处流传。声援大埔的青年学生到处“呛声”吴敦义、江宜桦、用泼漆、丢鸡蛋向官署等方式来表达不满。在 8 月 18 日《把国家还给人民》晚会更在凯道吸引了两万名群众，事后，支持大埔的群众更发动了“占领内政部”。他们聚集在中央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他们的涂鸭、种菜、演讲行动一直持续到隔天下午六点。

两起看起来都姓“公民”的抗争，引发了官方截然不同的反应。早在“万人送仲丘”晚会散场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就曾承诺缩减军事审判的范围，重新调查历年来军中的冤案。翌日，马英九也亲自前往洪仲丘的告别式，而迎接他的则是沿途不绝于耳的叫骂声。相对地，在占领内政部之后，政府官员指责这是触法的行为，警方会积极侦办处理，也不排除提出民事赔偿诉求。江宜桦强调，公民不服从的“公民”(civil)是具有“文明”的意义，而不是“不守法”，更不是“抗议团体毁损公物及攻击公务人员的行为”。政治学教授出身的江宜桦明显扭曲学理，civil 一词在此即是“法律的”、“政治的”，而与“文明”与否没有关系。如果按照他的逻辑，公民不服从只能限缩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么梭罗的抗税、甘地的抵制英货运动、金恩的民权游行都违背了当时的法律规定，也不能称为公民不服从了。

江宜桦明显有别的反应或许可以当作一种指标。遇到坚定但是温柔的公民运动，他没有恶言指责的空间。在三〇九反核大游行之后，他的讲法是“很感动，因为这是一种成功的公民参与”，尽管用鸟笼公投来坑杀高涨反核的民意，是他的政治妙算。但是对于挑战法律的公民不服从，他就连矫情的客套话都省了，直接搬出歪理，丑化攻讦。

法律真的是社会无法挑战的禁地吗？不合理的压迫只要躲藏在法律的背后，例如土地征收条例、都市计划审查，就是不得不忍受的宿命吗？台湾沉默的大多数是支持“法律与秩序”，不能接纳公然违法的公民不服从吗？

公民不服从在台湾

公民不服从最重要的意涵即是非暴力抵抗(nonviolence)，也就是以拒绝合作的方式来面对压迫者，谨守不伤害对方、不污辱对方的原则。公民不服从要求参与者相当的自制，因为在挑战法律的同时，他们就是要展现出道德与良心的高度。在著名的《伯明翰监狱书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金恩博士指出：

“你也许会问，‘为何要直接行动？为何要静坐、游行等？难道谈判不是比较好的方式？’你的说法没有错，要求谈判是对的，而这正是直接行动的目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就是要制造危机与紧张，唯有如此，向来拒绝谈判的小区才会被迫正视我们的议题。只有议题被戏剧化方式呈现之后，它才不会被忽视。我强调非暴力抵抗者要制造紧张，这种说法也许会很吓人。但是我也要坦承，我并不害怕‘紧张’这个词。我真诚地反对暴力性的紧张，但是有一种建设性的、非暴力的紧张，那是成长所必需的”。

理所当然，对于保守派人士而言，金恩所区分的“非暴力的紧张”与“暴力性的紧张”是没有意义的。只要踰越了法律的界线，就是违法乱纪的暴民；如果是被煽动的无知行为就算了，公然倡导则是不可宽恕的罪行。过去的纳粹党徒这样看待左派运动，3K 党如此对付民权人士，长期受国民党荫庇的极右派不是每次遇到社会抗争，就会高喊“统统捉起来吗？”

尽管如此，公民不服从的理念也曾在台湾被成功运用过，并且促成了政治改革。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城乡宣教协会(简称 URM)从加拿大引进这一套思潮，并且在八〇年代组训过一批有纪律的干部，他们投身于当时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其中以原住民运动的影响最明显。在以往，被捏造的吴凤神话将邹族描写为杀人嗜血，特意贬低原住民的自尊与文化。吴凤的神话被写入国民教育教科书，嘉义县邹族所居住的地区也被称为吴凤乡。1987 年 9 月，原权会与原住民大学生、长老教会牧师前往嘉义火车站前吴凤铜像抗议，他们手持“吴凤是劣士，莫那鲁道是烈士”、“拆除吴凤铜像”等布条，并朝铜像丢鸡蛋。最后，铜像被众人合力推倒。在抗争落幕后，教育部宣布删除教科书中的相关章节，嘉义县吴凤乡也更名为阿里山乡。

在 1991 年，以李镇源、林山田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〇〇行动联盟，他们要求废除刑法一百条的普通内乱罪。“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的条文过于空泛，尤其是“意图”两字等于是限制了思想自由。一〇〇联盟提出“爱与非暴力”的主张，以和平的静坐来进行“反阅兵、废恶法”。10 月 8 日，一〇〇联盟的前往总统府前阅兵台抗议，与在场的宪兵爆发流血冲突。一〇〇联盟开始在台大医学院前的静坐抗议，当行动和平的持续至国庆当天，宪警人员却于临晨强行进入台大，驱离抗议群众，将主事者载离现场，驱散其它的声援人士。被驱散的群众转往台大总校区继续进行静坐抗议。直到 10 月 10 日中午阅兵活动完全结束之后，被宪警人员载走的教授、学生与医师才被送到台大总校区会合。来年，政府终于修改了原有的刑法一百条。

破坏铜像与扰乱阅兵，都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抵抗，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统治者所宣颂扬的原则。根深蒂固的压迫体制并不会因为丧失了这些仪式，就自动垮台；但是这些抵抗却迫使统治者要花费更多的代价，去捍卫那些早就丧失正当性的压迫。这个道理可以解释为何



民权运动者要特意要霸占保留给白人的公共空间，他们就是要迫使种族主义者展露出丑陋的面貌，呈现出隔离制度的荒谬与不合理。

同样地，今天一连串“拆政府”的举动也是依循着公民不服从的理念，泼漆、丢鸡蛋、占领政府等活动就是要提升金恩所说的“紧张”。反吴凤神话与废除刑法一〇〇条，都是发生于解严不久之后的台湾，那时的国民党缺乏民主正当性，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抗争也有助于这一类的激进行动。然而，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已经巩固的台湾，公民不服从是否能成功，扭转掠夺人民土地的征收机制，打倒恣意妄为的土皇帝，仍是值得观察的议题。

“公民运动”在台湾

作为一种激进的运动策略，公民不服从的抗争不只是出现在大埔案，类似的手法可以在晚近的关厂工人抗争、华光小区、绍兴小区与文林苑等议题看到。相对地，走和平理性路线的公民运动，除了声援洪仲丘运动以外，也包括了反核与反国光石化运动。

我倾向于将“公民运动”视为一种论述的策略，重点不在于“公民”的实际内涵是什么，而是这个语汇所衬托出的他者。很明显地，“公民”所召唤的形象就不是“有党派色彩的”、“利己的”、“暴力激进的”政治参与。看看福岛核灾后的台湾反核风潮，最常出现在媒体上的运动者不外乎是艺文界人士，明星，或是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尽管民进党早在 1986 年的创党党纲中，高举反核的旗帜，但是新一波的反核运动再怎么看也与民进党无关。同样地，在 2011 年 4 月落幕的国光石化案，带头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艺文界、学者与青年学生，他们强调湿地的生态价值是无法用经济利益来计算。这种利他主义的诉求获得广大的共鸣，最后迫使马英九政府放弃这个开发案，因此，许多当时的评论意见强调“这是一场公民运动的典范”(张铁志)，或“公民运动的重大胜利”(何荣幸)。

从历史来看，“公民运动”也不在晚近才出现。作为一种区隔化的修辞，“公民”以往是以“小市民”或“市民”的方式出现。“小市民运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 1989 年的无住屋者运动，在 8 月 26 日，他们发起夜宿忠孝东路的运动，动员了超过万名的群众参与，展现了高度的群众动员与媒体造势能力。这些活动受到媒体极为正面的报导，也引发相当的关注。无住屋者运动强调“和平、非暴力、幽默、超越政党”的原则。放在解严后的社会脉络来看，这种运动带有浓厚的都市中产阶级气息，他们所以要张显的差异就是，“无壳蜗牛”并不是八〇年代末期激烈抗争的农民与工人，也与主打悲情的民进党街头运动无关。

“市民运动”或是“市民主义”则是出现在 1992 年的南台湾，当时一群高雄的记者、作家、医师关心都市生态议题，发起了柴山、卫武营的保育运动。他们透过文章写作、公众演讲、摄影展览、座谈会、生态解说员培训、联署签名等活动，向政府部门施压。市民运动所想象的改革途径是“经由广大人民缓慢而自发性的觉醒过程，凝聚意识、形成民意……向掌权谋利者要求回归属于人民的生存尊严”(王家祥)。尽管市民运动的论述没有



明显标志出他者，但是这一群中产阶级所关切的并不是工业污染问题，后劲、林园、大林蒲、大社等地在解严后爆发的反污染之围堵抗争与损害赔偿，也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环境运动。

因此，无论其名称是“小市民”、“市民”、“公民”，共同的都是一种修辞上的区隔，划分出一条理性和平、无党无派的参与路线。“公民运动”是正襟危坐、拘谨衿持的社运，总是小心翼翼避免触法，或是沾染政党色彩。从美国政治脉络来看，这种公民运动是难以想象的。曾一度声势浩大的茶党根本就是共和党内的另一个党，民权人士、工会干部、女权运动者向来积极介入民主党的初选。无论是来自左派或右派，激进的公民不服从也是常见的运动形态。如果这样的讲法是对的，为何台湾的政治氛围会鼓励、或特别宽容这一类“公民运动”？

我认为，在台湾脱离戒严威权的过程中，走的是若林正丈所谓的“分期付款的民主化”，国民党始终掌控改革的议程表，并且相当成功地将民主化包装成为自己的政绩。良心犯的政治牺牲、民主运动的街头抗争并没有被赋与应有的历史地位。再加上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失德，以及种种政党恶斗，也使得一般人对于政党缺乏好感。如此一来，社会运动的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压缩，到后来，只有这种和平理性与标榜守法的公民运动才会成为主流所能接受的类型。

合作亦或是冲突？

运动路线的差异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在许多社会运动的历史中，常可以看见的是同一阵营内的宗派主义斗争远比对抗共同敌人更为惨烈。以挑战法律为志的公民不服从与和平理性的公民运动，也有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占领内政部抗争之后，网络上就出现一些来自于白衫军的批评，认为这是过激的暴民行为。无论其真实性，过度高举和平理性的旗帜，其可能的副作用就是窄化了社运的策略选项，限缩在法律规范的界限之内。

以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公民不服从与公民运动相互合作、彼此声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保守无能的马英九政府已经激发出普遍的反弹。先不用说那些处境越来越困难的弱势群体，国民党政权是连一堆既得利益者都得罪光了，股民憎恨证所税、建商与投机客反对奢侈税、已退休公务员不甘他们的年终慰问金被砍，即将退休的公务员则是担心十八趴缩水。因此，可以想象，台湾的愤怒之夏并不会那么快落幕。

更重要地，公民运动的领导者也意识这一点，建立与既有社运组织的桥梁，而不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才会有出路。《公民觉醒》演讲提到了大埔、反核、反服贸等抗议，并且期待在场公民多多关切这些议题，“给他们一个掌声”。或许，更茁壮的公民运动将会有助



于扭转台湾畸型的政治文化，跨越出自我窄化的“和平理性”之限制，到那时，追求正义的公民不服从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黄丞仪：公民运动创造的宪法时刻



黄丞儀：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公民不服从，其实是民主社会所容许的状态，不见得每一次公民不服从都是“宪政危机”。立法院议事草率恣意，可以透过立法程序来弥补……这场公民运动正在创造一个宪法时刻，一股向上盘升的“宪政创造力量”或许可以让这场运动获得更高的历史意义，促使蓝绿双方抓住这个重要的宪法时刻，重新检讨沿用了二十三年的增修条文体制。**

自从 3 月 18 日晚上，反对服贸协议的学生和公民团体占领立法院以来，很多公共评论都认为台湾面临了严重的“宪政危机”。但是，到底“占领立法院”运动所创造的状态算不算是“宪政危机”？

公民不服从，其实是民主社会所容许的状态，不见得每一次公民不服从都是“宪政危机”。立法院议事草率恣意，可以透过立法程序来弥补。总统的角色混乱，源自宪法定位不清，相关条文未能修改前，某种程度上算是台湾独有的“宪政常态”。那么，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形？

这是一个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

“占领立法院”运动可以迅速地号召出成千上万的公民自主走上街头，声援立法院场内的学生和公民团体。除了因为大多数民众憎恶国民党立委以严重程序瑕疵的方式通过服贸协议外，许多公民其实更担忧服贸协议将引发的种种冲击。讲得更直接一点，是对于目前两岸谈判、缔约模式有着严重的不信任感。

TVBS 昨天发布民调指出，高达 70%的民众认为服贸协议应该逐条审议；相反地，认同整份协议可以包裹表决的，只有 8%。民调结果相当程度反映了人民认为两岸就经济事务缔结的协议（还先不说更敏感的政治协议），需要高密度的国会参与。这也显示了大多数人民对于行政部门的高度不信任。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的不信任，才能迅速动员如此广大的群众站出来，加入“占领立法院”运动。但是，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信任危机？病灶可能在于目前宪法

增修条文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提供的两岸交往架构，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的民主制度在面对中国时，还能够有效地运作下去。

宪法增修条文第九条对于两岸事务只有极为简略的规定，“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它事务之处理，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就这样，没了。

然而，和二十三年前（1991 年）通过增修条文时相比，目前两岸交往极为密切，人才物流、商业贸易、文化教育等关系，有如千丝万缕，根本不可能阻绝。而民主开放的台湾面对的是一党专政的中国，彼此经济规模差异甚大，这当中有太多复杂的议题需要谨慎小心，以免未来付出庞大的代价。

但是，宪法只有空白授权，由国会自己制定法律去规范。而国会又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量授权行政部门自己决定。行政部门再用许多行政命令来处理两岸事务，这一大批行政命令的制定过程相当不透明，公共参与的程度也极低。谈判过程以外交或国家安全的名义不予公开，谈判完了却要全民买单。这种过程纵然符合现行法律、符合现行宪法，但与国民主权原则有所冲突，使得宪法正当性产生动摇。

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目前没有触及敏感的政治谈判，但是马克思早就提醒世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问题，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和政治密不可分。更何况，按照目前执政党的计划，政治谈判终究要抬到桌面上。以现在的宪法架构，实在难以适应未来庞大的挑战。

更何况，大家都知道真正主导两岸政策的是总统，而总统的权力在我国宪法底下是极度不受约制。他可以任命行政院院长，他可以提名司法院大法官、监察委员、考试委员，如果他又领导国会多数党，五院全部都是他的。几乎可以说，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除非人民能够像这次一样站出来抵抗。但能有几次这种规模的公民运动？

对于许多声援“占领立法院”行动的公民而言，他们可能一点都不恐中，甚至希望台湾和中国有更良性的互动。但是，他们担心目前宪法所提供的两岸交往架构太容易成为权力滥用的温床。他们实在不知道在什么样不知情的状况下，会被莫名其妙地“代表”了，被牺牲了。他们甚至不相信热衷于往来两岸的蓝绿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能够为大家做到什么“民主把关”，好好审议法案，看好台湾人的利益。事实上，没有良好的制度，只会造成拥有资源的政治行动者竞逐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导致公共利益完全被抛诸脑后。要将两岸协议交由国会来作风险控管，恐怕只是一种善意的期待而已。

如果我们可以跳出这些法案争议，这次“占领立法院”行动带出来的深层意涵就是：台湾人民想要有一个更清楚透明、更审慎周延、更能有效确保台湾权益的两岸交往架构。

而这套架构必须确保“目前民主制度仍可有效运作下去”。因此，立宪主义是重要的：权力分立需要更进一步的廓清，对中谈判的架构必须超越“国会保留”而进入到“宪法保



留”的层次，国会授权或监督方式也必须更紧密周延，行政权的谈判前置作业必须提升公共参与，广纳意见。

这场运动不仅仅是在抗议服贸审议程序的草率，而是诚实地把台湾人最深沉的忧虑及渴望展现出来，蓝绿政党都必须正视这项挑战：二十三年前制定的旧增修条文体制已经无法应付二十一世纪的两岸交往挑战，修宪的需求迫在眉睫。如果不从修宪着手，永远都会卡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龃龉，两岸协议是不是要适用行政命令审查程序，也会一直在法律的层次继续打转。

再说一次，这不是一般的国际贸易条约，而是隶属于我国宪法独有的两岸交往架构。因此，无论是哪一种两岸协议的缔结与监督，都应该从“宪法保留”的角度去思考，哪些可以授权国会立法管制，哪些属于行政权运作范畴，哪些则重要到必须让人民亲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让“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变成一部小宪法，陆委会变成超级机关。

同时，也要从宪法上去调整总统和行政院的权力关系，把陈年宿疾一并解决了：究竟行政权首长是谁？如果行政院院长永远只是总统的代理人而已，立法院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监督制衡行政权？过去这几年，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这套制度蕴含诸多弊端（鼓励总统扩权，也鼓励总统卸责）。在两岸政策上面，这些结构性缺陷更容易被凸显放大，它所带来的危害也将更为庞大。

台湾终究是要面对中国的。但是台湾社会弥漫的不信任感，会让我们在和中国交往时，失去判断的准确和掌握正确时机。透过修宪，可以有一套权力平衡且合乎当前现实需求的宪法制度，让台湾人民的国民主权获得充分实践，避免行政滥权，也预防国会草率审议形同虚设。或许可以慢慢解消台湾人的国家焦虑，提高公民社会对于两岸交往架构的政治信任感。

这场公民运动正在创造一个宪法时刻，一股向上盘升的“宪政创造力量”或许可以让这场运动获得更高的历史意义，促使蓝绿双方抓住这个重要的宪法时刻，重新检讨沿用了二十三年的增修条文体制。看看这个简陋的宪法架构，已经无法满足台湾社会的信任需求，也不符合国民主权原则，更难以应付未来五十年两岸之间的安全交往。相信只有更宏观、更具开创性的宪法新架构，才能带给台湾人民更大的安全感和保障，并确保我们以及下一代的幸福。

这是不分蓝绿，都应该全力以赴的时代使命，切莫让这宪法时刻稍纵即逝。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论

顾忠华：三“失”而后“行”：公民社会如何挽救失控政府、失灵国会与失声政党


顾忠华：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学运告一段落后，，台湾的公民社会必须在不同的战线上，针对失控政府、失灵国会、失声政党这“三失”，分别对症下药，才能避免民主不进反退，甚至被对岸鲸吞蚕食掉自由的生活方式。这可以视作是“公民宪政会议”的重大使命，也是“自力救济”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

太阳花学运光荣撤退，让所有大人们松了一口气，但整整三个星期，却完全暴露出台湾目前面临的各类型危机。概括言之，服贸协议虽然始于国会审查程序的不正义，这导致学生攻进立法院、鼓动学潮；但实际上无论从协议的黑箱谈判，到处理学运抗争的粗暴手法，在在显示行政部门冥顽不灵的心态，以致被严厉批判失去了统治正当性，造成德国社会学者哈伯马斯(J. Habermas)形容的“合法性危机”；至于应该汇集民意、为集体意志发声的政党，则在这场事件中不是装聋作哑(执政党)，便是沦为配角(在野党)。这种政府失控、国会失灵、政党失声同时发生的“三失”现象，的确反映了台湾作为新兴民主国家容易陷入的困境。

所幸的是，当学生带头占据议场、公民团体迅速补位开始，我们见证了台湾公民社会“自力救济”的庞大能量。光以三天时间，能够面面俱到筹备五十万人和平集会的组织力与执行力，以及学运期间在思想论述、行动策略、广告文宣、国际连结等等方面的创意和效率，都令世人惊艳。而日前某几位囿于意识形态、长期抹黑教改人士，竟然污蔑青年世代受到教改荼毒，事实证明二十年前启动的“四一 0 教改运动”，有效地解放了学生群体的想象力和自主性，让他们能够毫无畏惧地在媒体前侃侃而谈，轻松修理油腔滑调的名嘴及



政客。经历太阳花的洗礼，即使有人还习惯指称年青人为“草莓世代”，他们也已练就一身抗压功夫，进阶到“钢铁草莓”的境界了。

学运告一段落后，，台湾的公民社会必须在不同的战线上，针对失控政府、失灵国会、失声政党这“三失”，分别对症下药，才能避免民主不进反退，甚至被对岸鲸吞蚕食掉自由的生活方式。这可以视作是“公民宪政会议”的重大使命，也是“自力救济”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譬如，马政府之所以一再失控，主要的原因是决策过于封闭、执行无能，遂使民怨四起，化解之道应该朝向治理模式的民主化，引进更多信息公开及公民参与的机制，方能杜绝如服贸协议闭门造车的覆辙。

另外，国人恐怕相当担心，当国会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及服贸协议时，是否朝野立委又将回到吵吵闹闹、脱序扭打的场景，无法响应学运诉求？这牵涉到国会席次的结构性问题，目前尚难下定论。不过，在野党凭借民气可用的态势，不可能轻易同意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前，同时逐条审查服贸协议，否则学运风潮再起，王金平院长势必难逃背离承诺的罪名。就此来看，短期内国会乱象似无解决迹象，但若国会议长善用其无意间取得的“超然中立”角色，国会本身的制度性改革未尝不能有所突破，重新争取国人信任。

最后，自从台湾进入竞争型的政党政治以来，许多令人诟病的问题逐渐浮现，包括选举的游戏规则不尽公平、党产沈疴无法根除、党内民主缺乏规范…等等，但或许王院长被开除党籍的官司，可以为适度导引政党朝向开放透明，乃至订定《政党法》跨出一步。而此次学运突显出既有政党在社会议题的敏感度上，远远不及青年学子和公民团体，则是另一层次的严肃课题，亟待如“公民宪政会议”汇集各阶层、各领域的广泛意见，供有心振作、不甘愿边缘化的政党认真参考。

以上所举“三失现象”，不过是荦荦大端的几项，“公民宪政会议”也可以彻底检讨台湾的宪政体制，并透过网络平台的沟通方式，寻求落实“审议式民主”的宪改共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感谢这批勇敢的“初生之犊”，为台湾的民主开启重生的契机，公民社会的力量这时不应再犹豫了，一场更为盛大的“公民自救运动”，就由“公民宪政会议”开始“起而行”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林倖妃、邓凯元：台湾民主深化的契机

林倖妃、邓凯元：《天下杂志》记者

“

不可讳言，民主，一直是陷入蓝绿和统独纷扰的台湾，拥有的最大共识，也是台湾最引以为傲的价值……太阳花学运映照出台湾躲在“代议政治”背后的阴暗面。在学生攻占国会前，多年来两党立委的关说疑云、密室协商、言语暴力、叫嚣扭打、霸占主席台，早已使国会殿堂蒙羞，普遍失去人民的信任与尊敬。

”

服贸争议，掀起巨浪。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世代、阶级问题。争议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它能否成为台湾迈向民主深化与公民社会的试金石？

「这场运动绝对不属于我们个人，这场运动属于在场的各位，」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之一林飞帆，沉稳地拿着麦克风。

在他面前的，是参与三三〇反服贸游行的五十万名黑衫军，以及千万双盯着电视转播的眼睛，「人民就是这个国家的总指挥，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他说。

语气未歇，台下已经爆出欢呼声浪，更有人频频拭泪。三月三十号这一天，是一场夹杂花朵和歌声，嘉年华式的街头运动，也是一场充满自制、守秩序的和平非暴力抗争。

从三一八占领国会，开启了太阳花学运，到三三〇凯道游行，这场反服贸运动，直到今日，还没有结束。

这场运动，不仅搅动了台湾社会，也引起中国及全世界的关注。

服贸争议至今，政治运作跌入黑洞，社会人心两极撕裂，信任资本不断消耗。

沉默的大众，逐渐开始有不同声音。「虽然我同意学生的诉求，但方法错了。学运期间造成的公物损失，以及公务机关执法过当的情形，检察官应提出告诉，」中国人寿业务主任赵恭信说。

支持和反对服贸双方的诉求，更如楚河汉界的两军对峙。一方说，台湾要活水，通过服贸，人民可以优游于竞争海洋；另一方说，小心服贸，带来对台湾政治、社会、民主生活的影响，和贫富差距拉大。



这样的拉扯和冲突，在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身上，展露无遗。他代表产业界出面支持服贸。但私底下，他捐款送物资到立法院，多天后，竟发现自己念大学的孩子也在现场。

「年轻人要反省。你们的忧虑、生气，大家都听到了。但是，躲起来，不和大陆竞争，将来如何在国际竞争？」从事电子业，第一天就和全球竞争的他，在现场问学生。

但他也更看到世代不公义。「大人要反省。电子业有竞争力；但开放之后，弱势产业会不会崩盘？我身为经济优势的大人，我买得起房子，年轻人却很担忧结构性地沦为弱势。这不是林飞帆或魏扬就可以挑起这么大的社会运动，也不仅是立法技术的问题，」他心痛地说。

服贸争议，掀起巨浪，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世代、阶级问题。争议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它有机会成为促成台湾迈向民主深化与公民社会的试金石吗？

过去的政治冲突跳脱不了蓝绿、统独、家长主义式的框架，但这波学生运动却超越旧有框架。

太阳花学运是年轻人对既有权力体制的挑战。挑战台湾失灵的代议政治、挑战蓝绿政党的恶斗、挑战不透明的政府决策，更挑战了家长主义式的和解方式，以为大学校长出面，就能促成和解。

超越蓝绿、统独的新学运

新世代所展现的沟通方式，也让传统政府难以招架。马政府的沟通，主要还是由上而下，依赖传统媒介宣导与传达。抗议学生则是社群媒体的高手，强调参与、互动和即时性，并且透过新科技即时对国际媒体转播，例如 CNN 的公民新闻平台 iReport；靠网路募资，在《纽约时报》登全版广告。

面对无畏的年轻人，若要凝聚出新的共识，必须由掌握权力者协调，让不同的意见找到交集点，形成「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这也是美国知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主张。

他谈到像美国这样多种族、多信仰、多元价值的社会里，如果要维持政治稳定，一定要有基本的共识作为基础。

多元价值冲突在民主社会是常态，有权者必须做中间的调和者，否则将失去统治正当性。争执双方都需要积极地回应跟解决。

「政府如果以为人民有疑虑，多说几次就可以，那就是再度误判情势，」政治大学社会系教授顾忠华把学生带到立法院外的济南路，去上一堂民主的课。「因为沟通要先聆听，知道人民反对的是什么，若只是多说几次像答录机，那政府和人民间还是平行线，」他说。

建立共识的第一步，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走入别人的视域，才能开始真实的对话，才能找出彼此的「交叠共识」。

太阳花学运究竟反映了新世代什么样的价值观或恐惧感？

危机一：代议政治崩解

不可讳言，民主，一直是陷入蓝绿和统独纷扰的台湾，拥有的最大共识，也是台湾最引以为傲的价值。

这一波的太阳花学运，年轻人用行动对台湾扭曲的民主制度，投下不信任票。

先是两百人占领立法院，意外吸引场外累积超过十万人的支持，写着「反服贸」、「反黑箱服贸」的黄色旗帜在各处飘扬。接着更扩大占领行政院，虽然被警方驱离，却引发一波全国大专院校系罢课的连锁效应。

他们从出生后，历经台湾民主的重大事件，是见过世面的民主世代。

一九九〇年野百合学运，学生提出四大诉求，在社会冲突动荡告一段落后，启动「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等民主重建工程。

二〇〇〇年政党轮替，反对党首度执政，政权和平转移，缔造华人社会民主化里程碑；〇四年「三一九枪击案」震惊国内外，尽管蓝绿两极对立撕裂，台湾人民仍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并在〇八年和平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

但民主却也让台湾青年世代——一如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失望了。

英国《经济学人》以「民主出了什么差错？」（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为题，分析造成许多国家民主失败的关键之一，是国家太强调选举，却花太少精力在建构基本的民主所需特质，如监督政府的力量。成功运作的新民主，则是避免了赢者全拿的多数主义。

太阳花学运映照出台湾躲在「代议政治」背后的阴暗面。

在学生攻占国会前，多年来两党立委的关说疑云、密室协商、言语暴力、叫嚣扭打、霸占主席台，早已使国会殿堂蒙羞，普遍失去人民的信任与尊敬。

连续在立法院议场和学生静坐超过十天，台大社会系助理教授陈惠敏解释，「影响人民福祉的公共议题，长期任由政党关说协商，进行黑箱交换，造成民主的扭曲。」

事实上，去年七月，由律师赖中强和学者组成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以及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就开始研究服贸协议内容，并利用各种管道推动反服贸，但社会反应冷淡。

直到在国会占有多数优势的执政党，内政委员会轮值召委张庆忠，违反上会期通过「服贸条例必须逐条审查」的共识，拿出自备的「小蜜蜂」麦克风，躲在厕所旁自行宣布迳送院会，违反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引发全民哗然。



「一开始是 NGO 发起一百二十小时守护台湾活动，到张庆忠事件后，学生才觉得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学生领袖之一林飞帆坦承。

政党政治失灵，民主变得有如荒谬剧，不仅激化学生运动的诞生，也获得许多民众支持。

太阳花运动中，支持孩子上街头的父母，很多都是中产阶级，也认为民主制度是希望与改变的开始。「这是信奉民主的 Y 世代，和相信经济的 X 世代的战争。台湾未来很有希望，可以打破负循环，」一位全球网路科技龙头 CEO 表示，应该藉机重新建立一个民主的新秩序。

也有观察者建议，学生如果真想改变台湾的民主缺失，除抗议外，也可以开始考虑参与长期的国会监督机构与社团。

危机二：对中国不信任

反服贸运动的背后，除了争取民主程序正义外，更反映出对中国大陆、对政府效能与执行力、对自由贸易操作方式的不信任。

抗议者和政府或企业家认知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经济市场，角度不同。

马英九上任以来，便积极改善两岸关系，服贸协议是促进两岸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今年元旦，马总统宣示，二〇一四年是拼经济的关键年。在全球化浪潮中，他担忧台湾被边缘化，经贸策略的路径是今年签署服贸，并加速进入 TPP 和 RCEP。面对服贸反对声浪，他曾私下表示，「签台星、台纽都没问题，为什么服贸就有问题？为什么逢中必反？」

他在总统府接待外国来宾时，经常沟通的政绩之一，是改善了两岸关系。包括对国际媒体《经济学人》强调：过去六年，来台的大陆观光客成长十倍，到了一三年达到二八五万人；两岸班机从零增加为每天一一八次航班；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包括香港），一年可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

但这一堆数字，却无法化解人民心中对中国的疑虑。

「面对一个非民主国家，」台大新闻研究所所长洪贞玲说，「台湾要和对岸签订任何协议，都应该要有监督和评估机制。」所谓民主，就是要资讯公开透明，让人民可以做正确判断和选择。

台大社会科学院院长、经济系教授林惠玲提醒，虽然自由竞争可以提升效率，但台湾和对岸还处于敏感状态，「若是只着眼于经济利益，却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反而得不偿失。」

危机三：全球化的恐惧



令人民不信任的，还有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经济策略。当政府不断推动加入自由贸易市场，却忽视了年轻人的忧虑，「我们反对的除了服贸，更可以扩大成反贸易自由化，」黑岛青成员之一、台大历史系博士班学生周馥仪说。

黑岛青在这次发出的宣言中明白表示，他们担心的是自由化只让大资本家受益，财团可以无限制、跨海峡扩张，服贸牵涉的是一个少数大资本，吞噬多数小农小工小商的阶级问题，更是所有台湾青年未来都将面临的严苛生存问题。

生存，这两个字挑动了年轻世代最敏感的神经。「我丢张请假单，就跑到台北来，」屏东教育大学学生馒头说，请假单上的事由，只写了「家里有事」四个字。

「我的爸爸是面包师傅，弟弟是水电工，」馒头说，「难道服贸不关我家的事吗？」服贸不只冲击劳工，即将毕业的他要面对的，还有高失业率、低起薪的就业环境。

林惠玲认为，开放的前提是公平竞争，但中国是大国，台湾是小国，规模不对等，中国更可能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垄断，不跟随市场机制。

也因此，和对岸的协议内容更需要评估，谁得利？谁受害？算出整体利益，并订出补偿配套，「这些都要事前评估，而不是签署后，再从上面交给下面进行事后评估，」林惠玲说，她赞成开放，但仍须有准则与配套。

建立公民社会的对话机制

许多在台湾投资打拚的企业主逐渐感觉到，不论谁执政，政府如果无法找到与公民社会对话的机制，所有投资桉都将一事无成，经济也将倒退。

从国光石化、苗栗大埔、到中科四期，台湾变成一个公民运动主导社会议题的社会。这些公民运动背后有教授提供理论基础，有年轻人冲撞，有社会支持者与媒体声援，凝聚这些公民运动的不是蓝绿，而是价值。

社会运动的本质就是要冲撞体制，采用的国际标准与普世价值，常常走得比较快。关键在于，行政与立法两大国家机构，怎么样回应这些要求，调和出适合台湾国情所需的决策。

历史学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时为文表示，太阳花运动是「一场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人民通过运动巩固公民权利；政府也可以因听到人民的声音，提高民主素养。

虽然台湾在国际情势的处境是艰困的；在经济发展上是挑战的，但「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他说。

太阳花升起，暴露台湾代议政治失能、对中国不信任、全球化忧虑等深层问题。

但台湾的未来，不能只有社会运动，服贸争议到今天，已经到了和解的必要时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刘兆佳：
思考香港政治需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


刘兆佳：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

在“执政党”缺位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在立法会内缺乏稳定和可靠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无论是建制派政党还是反对派政党都以监督和制衡政府为己任；建制派和反对派政党都处于松散和积弱状态，社会支持基础不强。反对党由于不能上台执政，因此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和愈趋激烈的趋势。

”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作者过去近 40 年研究香港政治的经验，说明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的重要意义，并着重指出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在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过程中，作者曾经提出一系列用以理解和分析香港政治变迁和港人政治文化的概念。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社会容纳政治”、“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没有独立的非殖化”等。这些重要概念来自运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有别于其它社会之处。它们汇集起来明确反映了香港的独特性。

【关 键 词】香港政治/香港政治文化/香港政治研究

引 言

过去近 40 年来，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是我的研究重点。这个研究重点的确立，不完全由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反而在更大程度上与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冒起有关。

一直以来，对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学者来说，“香港研究”的“实用”价值不高，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香港研究”的论文颇为困难，研究香港现象和问题对获得国际知名度不

太有利，然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却事关重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以“香港研究”为终身职志，主要原因是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中的研究成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具有传世价值。无论如何，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只有这样，研究者才会享受到“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从事抽象理论探讨，因此不需要特别对某一个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的课题。对我来说，“纯理论”的思考容易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反而会妨碍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理解。

不过，作为一位社会学者，完全不理会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方面的价值也不可能。因此，我在国外发表的不少论文中，都会着重指出香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对理论建设的意义，特别是它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对西方的理论提供参考素材，从而丰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西方的主流学术刊物也不会有兴趣发表那些毫无理论价值的关于香港的研究论文。我强调香港的独特性是我的香港研究对理论建设最有贡献的地方，也是让我得以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发表著作的原因。

随着“九七”问题的出现，“香港研究”愈来愈变成迫切的实际需要。作为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往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提出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择是由香港面对的现实情况和迫切问题与危机决定，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更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变迁与争辩关系不大。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处社会环境和自定工作目标都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总的来说，突出香港的独特性作为研究香港政治的钥匙，与我个人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和工作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文请点击原文链接阅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笑蜀：看见台湾，看见大陆



笑蜀：作家，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 **抗争要有依托，依托就是社会；抗争要有掩体，掩体就是社会。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

他这么说，是因为电影的后半部，几乎全是台湾环境污染的镜头，都是批评人类的贪婪，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用主题曲来说，叫做“拿的那么多”。

我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回答：“是的，都有问题，但性质不同。”

朋友好奇：“怎么个不同法？”

“你们这电影能公映。要在我们那边，连选题都通不过，”我说。其实，《看见台湾》岂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湾引爆了剧烈的舆论龙卷风，迫使台湾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诺改进。

“应该是习惯问题。大陆政府还不习惯公共参与，公共讨论。但不急，慢慢会好起来的。”朋友安慰我说。

“兄弟，哪是什么习惯问题。”我急了，连连摇头：“你们有问题但更有办法，所以不怕曝光。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招，只好捂盖子，结果越捂越烂。”

朋友听了，长叹口气。他是大陆问题专家，何尝不懂我的话。两人默默无语，走到影院门口挥手告别。

回头想想，觉得自己似有失态。大概是“慢慢来”三个字刺激了我。经常有外面的朋友那么劝我，我知道他们都好心，但听多了仍不免抵触。我不同意大陆很多问题是快和慢的问题，不是我们性急，不是我们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决，而的确很多问题都无解，都属于不可治理的问题。

就说污染吧。有次半夜飞抵武汉，从半空望下去，我仿佛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巨盆，倒扣着整个城市。巨盆中的空气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脏的水。我当时就心凉：这是我栖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脏水中吐纳，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



但是，亿万同胞，确实都栖息在脏水中，波澜不惊。以至于有外媒嘲笑：他们面对雾霾不是上街抗议寻求改变，而是宁愿天天戴口罩。有办法的人用脚投票，一走了之，没办法的人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都不否认必须改变，但谁都不相信可以改变。

社会问题，社会危机，一定都伴随社会抗争。有争才有变，这本来是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这似乎不适合中国，中国简直就是规律的黑洞，抗争的量级跟污染的量级完全不对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问题倒逼、危机倒逼，但这在中国更多是幻想，不仅很难倒逼出改变，反而不断地压低底线，包括压低道德的底线和公众的承受底线。

怒其不争，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情绪。愤怒的口水不仅喷向当局，也喷向民众。极端如烧死四十七名无辜乘客的厦门公车纵火案，都有人为之辩解，声称遇难者并非真正无辜，因为他们面对暴政没有挺身而出，客观上都是同谋，都有原罪。口水满天飞，几乎骂遍天下。

“不争”固然令人扼腕，但追问不能到此止步，还应该再问下去：为什么不争？难道，真因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希望？“争”是需要的；但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完全不问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骂倒，众人皆醉我独醒，这除了盲目的发泄，对社会进步没有任何价值。

“争”需要怎样的条件？还是对比台湾吧。蒋介石时代的台湾，民众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杀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吓倒，以至蒋介石镇压雷震组党时，没有任何镇压成本可言，因为民间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是到了 70 年代中期，一方面随着经济腾飞和均富的实现，产生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再没有父辈的杯弓蛇影。总之社会已经崛起。有了崛起的社会作为植被，就形成丰富的生态。正是靠这整个的生态支撑，才有了美丽岛的大规模集结，才有了美丽岛被镇压后持续高涨的抗争。持续高涨的抗争宣告了镇压的无效，迫使统治者退让，也才有了解严，有了台湾的和平转型。

抗争要有依托，依托就是社会；抗争要有掩体，掩体就是社会。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下中国不只政治腐败，更大的危机，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强调的社会溃败。溃败的社会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个人面对利维坦的无力无助，是人性的常态。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怯懦未可厚非，一概归为原罪过于苛刻。

苛求个人不是出路，关键是保卫社会、抢救社会，而这已经刻不容缓。

在我看来，六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损失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在以下两端：一是文化上，即中华正统文化被彻底切断，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性质的本土的流寇主义、痞子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与同样野蛮的舶来的斯拉夫专制主义杂交，生成畸形的红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难肃清。整个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丛林世界，距仁爱、宽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则愈来愈远。

再一个，就是整个民间社会被连根拔掉。公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结果是窒息、扼杀了社会。本义上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为要义，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恰恰是反社会的。改革时代开启了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并扩大到社会领域，社会逐步生长起来，公权力有所收缩。但进入维稳时代后，公权力尤其专政机器全面反扑。不惜耗费天价维稳成本，对社会严防死守，恐惧一切社会自组织，恐惧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惧一切建立在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由联合。

回头说到台湾。台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宪政体制问题、有司法体制问题，经济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个台湾依然安详、从容。奥妙何在？在于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甚至属于政府的很多职能，也让渡给了社会。比如办证和缴费，通常无须找政府，到家门口的 7-ELEVEN，多媒体终端机上敲几个键，就全都解决了。市民办事再方便不过，政府却为此付出很大牺牲，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很多公务员就只好下岗了。

这反映台湾鲜为人道的一个特点：台湾的民主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台湾的自由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政府该退出的领域，统统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还多。但政府退出后，社会没乱，反而越来越好。几乎每个来台湾的大陆同胞，都能感受到社会的井然有序；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贴；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极其强悍。所以台湾不怕有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不难及时发现，进而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解决。

对比台湾，我们最大的短板就是社会。从来视社会为最大的假想敌，为了保卫政权，不惜糟蹋社会。社会自发秩序被破坏，自净机制难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则只在统治不在治理，社会问题也就不能不彻底失控，越来越逼近社会的承受极限，如悬河随时可能溃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公民运动应运而生。它不是像列宁主义那样，只有政权的视角，主张政权中心论，而坚信社会才是我们的主场。它不是砸烂，而是建设；不是破坏，而是生长；不幻想一夜而决一击即中，而是向下扎根，用权利组织社会，培植社会的元气。本质上属于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在任何时候都重要，民主化之前则尤其重要。因为民主化之后，社会建设水到渠成；最紧缺也最难熬的只在民主化之前。而亿万生灵不可能等到漫长的民主化之后再来安顿，现在就必须着手。



这也是我认同新公民运动的原因。新公民运动发起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实际地涉入，只想做一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把我逼到墙角，我别无选择。受难者很多是我的兄弟，仅从江湖道义讲，都不能壁上观。更何况在我看来，新公民运动代表一种价值、一种希望，必须守护。不因镇压而溃散，而是开始新的集结，抗争才会持续；唯有持续的抗争才会让镇压失效，也才会给公权力勘定不可逾越的边界。所以，镇压不应是终点，新公民运动必须接力下去——这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回顾一下 20 世纪中国史，或更有助于认识社会的重要。20 世纪中国史，政治上往往是一部瞎折腾的历史。无论在朝在野，都是惟政权论，缺乏社会的视角。在朝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社会百般钳制；在野的急于乱中取胜，见猎心喜，巴不得社会越乱越好，苦难越多越好，以至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所有中间道路、所有社会建设，都当作“帮闲帮凶”加以冷酷的攻击。双方都不惜以社会为牺牲品。结果是神仙打仗，社会遭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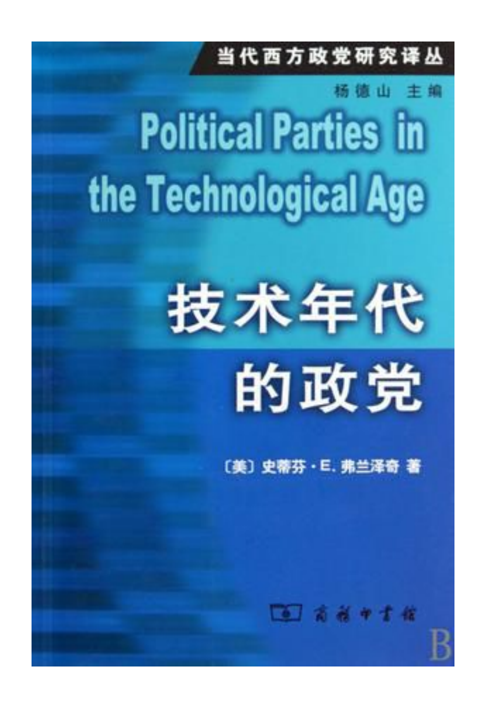
这一切，我们受够了，对社会的糟蹋该到头了。政治之外，更有社会。社会是我们的失地，社会是我们的原乡。所谓抢救社会，无非从政治手中收复失地，找回我们的原乡而已。这一切，且从凝聚权利共识，从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开始。告别私语，告别怨妇情结，告别政治乌托邦，回到社会，回到生活，从真实的大地上找到力量。这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也是所有权利运动、所有社会建设的意义。彼岸同胞早就看见台湾，回到他们的原乡，无论怎样深重的哀愁，都是他们能够改变的。那么，我们的原乡有多远？改变有多远？

——写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许志永被正式起诉之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史蒂芬•E•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



作者：[美]史蒂芬•E.弗兰泽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译者：李秀梅

出版年：2010-04

页数：441

定价：32.00 元

装帧：平装

丛书：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

ISBN：9787100040730

本书为“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中的一本。全书共分八章，主要探讨了美国政治中的中介组织，美国政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政党和候选人提名，政党和候选人提名，投票人：

政党意欲影响的目标，政治的竞选运动：最终的考验等方面的知识。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的政党理论研究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书目信息和简介来自豆瓣)

【回到目录】



荐书：约书亚•科兰滋克 Joshua Kurlantzick《倒退的民主》(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倒退的民主》探索了为何“北京共识”获得越来越多的拥趸。近年开发中世界在追求高品质民主制度上发生一些挫败，本书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解释。Kurlantzick 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未能施出全力，带出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福祉，例如自由和民权。读完本书，令人格外难以把华府视为优质政策和智慧的根源。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施钰涵

设计：池春荣、胡馨以、潘雯怡

校订：李佳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 Co-China 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